高添強序

首次接觸夏思義博士，是在 1980 年代拜讀了他一篇有關鄉村喪禮的文章。筆者雖然土生土長，然而和大多數同輩一樣，對本地的傳統習俗可説是一竅不通。在十多年的中小學生涯中，老師在課堂上從不解釋這些習俗背後代表的意義；即使對於像盂蘭節這樣普通的節日，亦完全不明所以，也不知每年某些日子為什麼要打醮。讀到夏博士的文章，非常驚訝一位西方學者（當時他的正職其實是公務員）會這樣細心觀察並以文字記錄一場喪禮，也使筆者開始注意身邊其他的習俗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到了 1990 年代初，在機緣巧合之下，筆者加入了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並經常參加學會的活動，包括講座和實地考察，獲益良多之餘，也經常見到夏博士。還記得第一次出席他的講座，主題是本地山歌。講座結束後，和夏博士傾談一會，覺得他非常平易近人。當時筆者已對本地歷史有着濃厚的興趣，夏博士隨即鼓勵筆者收集各類資料，將來或許能增進大家對香港的認識。

1998 年，筆者獲邀成為學會的幹事，幾年間經常和夏博士共事之餘，有時更一起策劃活動和實地考察，漸漸發覺彼此志趣相投，特別是對舊村落存有強烈的好奇心，如九龍仔、九龍塘、芒角、尖沙咀、土瓜灣、牛池灣、牛頭角、晒草灣等，還有原本位於深水埗至長沙灣及九龍城附近的大小村落。我們會面時，閒談之間話題很快便扯到這些舊村和相關的廟宇上。還記得當時土地發展公司（市區重建局前身）和發展商合作，打算重建衙前圍村。對於這條富有歷史意義的村落快要消失，我們都感到很難過。不久政府計劃清拆九龍城侯王廟對開的侯王新村（包括附近的何家園和荔枝園），大家一方面理解發展的道理，卻仍覺得有點可惜，除了再次到訪之外，只能拍照作記錄。本書有一章便談到侯王新村的歷史。

夏博士在 1972 年來到香港，不久即對本地歷史產生濃厚興趣，兩三年間已

基本掌握本地方言，並以極大的毅力學習中文，數十年來還於工餘時間，孜孜不倦地學習本地歷史、習俗乃至風水知識，更着力收集鄉村文獻（現存於中央圖書館），惟他最大的興趣，其實是平民的歷史和生活。

退休後，夏博士繼續鑽研本地歷史，並寫下大量學術文章，出版多本專著，一些更屬開創性的題材，如 1899 年「新界」地方領袖反抗英國管治而起的「六日戰爭」、二十世紀初的新界人口研究、新界地區的習慣法、鄉村教育、本地齋堂、明清時期與香港地區有關的官員、鄉村喪葬、華南信仰和習俗、官鹽的生產和管理等；此外，還有大量的地區研究。夏博士亦撰寫不少資料豐富的短文，內容包羅萬有，如稻米種植、石灰窟、鄉村茅廁與施肥等。

過去許多研究香港史的專家學者，往往以鴉片戰爭後清廷向大英帝國割讓香港島，作為香港歷史的起點；這樣在有意無意之間，便忽略了在此之前，今天稱為「香港」的地區，至少早在宋代已有着相當顯著的經濟生產和發展。可惜的是，上述觀點，至今在香港史學界和現實的香港社會中，還是很有市場。夏博士自始已對這類史觀不以為然，數十年來一直致力研究英治以前的本地歷史，對新界地區數百年來的發展，可說是瞭如指掌。

夏博士雖然出身英國的頂尖學府，不過他從不空談什麼歷史和文化理論，反而會窮究史料，實地考察和訪問，本書便是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筆者期盼夏博士的其他專著和文章就像本書一樣，也會有中文版面世的一天，使更多讀者進一步認識和理解香港的過去。

高添強

2025 年 6 月

中文版自序

在十六歲那年，筆者明白到自己有志成為歷史學家；那時便已知道，自己最想要做到的，就是能夠了解祖先如何生活、工作、飲食、戀愛、購物、祭拜和過世。這是筆者一直拳拳服膺的覺悟。筆者至今仍然深切渴望真正了解自己的祖先和他們的生活方式，無法想像要是沒有歷史往事縈繞心頭，自己將會如何過活。

從成為研習歷史的學生那一刻開始，筆者就全心全意地投入於探討地方史，想知道平民百姓怎樣生活、工作和離世。筆者對帝王或政治黨派不感興趣，尤其覺得國家政治的興亡盛衰十分乏味。筆者也無意於研究戰爭，在地方層面發生的戰爭除外。讓筆者感到心靈充實的，是普通男女、村民和漁民、地方學者和商人的故事。鄉村的歷史、它們的發展、它們之間的結盟與敵對、宗教習俗、村民購物的墟鎮、他們對於所身處的世界的認識、他們能獲得的教育機會，以及所能達到的學術水平，這些才是令筆者感到心滿意足的研究題材。

這些普通人就是我們的祖宗，他們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如果我們不努力去了解他們的生活、艱辛、喜悅、悲傷和成就，就無法了解自己，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後裔，我們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全因他們的努力和奮鬥。

本書是筆者五十年來研究新界鄉村的成果。筆者使用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書寫文獻——族譜、廟宇碑文、地契等等，不過這些資料往往是片面和不完整的。除此之外，筆者還向鄉村耆老訪談，聽他們憶述年輕時村中的情形，那就是這些鄉村被近幾十年翻天覆地的城市化發展改變之前的歲月；另外還請耆老回想祖父母在他們年少時如何描述他們出生前村中的景況。這些受訪的鄉村耆老大約生於 1910 年至 1930 年之間，而大多數訪談是在 1980 年至 1990 年間進行的，那時他們仍然健在，可以接受訪問。這些口述歷史必須謹慎待之，因為耆老的記憶難

免會隨着時間過去而有所扭曲；不過若能小心求證，這些缺陷是可以彌補的。筆者相信，只要能用心竭力，我們對於城市化發展開始之前的鄉村及其社會狀況，是可以獲得頗為符合事實的記述；不過現在這件事已愈來愈困難了，因為對於日佔時期以前的鄉村情況有親身記憶的耆老，現已大多不在人世。這本書就是上述研究的成果，希望讀者會覺得從中有所收穫。

研究當中難免有一些缺漏。最明顯的是，我所訪談的耆老都是男性。年長的鄉村婦女不願與男性學者，尤其是年輕得可以當她們的孫子的男性學者交談。筆者對於傳統鄉村社會中婦女的角色和地位所知甚少，僅能明白到自己對於鄉村生活中的這個重要部分極為無知。婦女對鄉村社會（以及鄉村政治）的重要性遠高於我們所想，但當中的細節大多並不是我們所能夠獲悉的。

然而，仍有一些學者，包括許多聲名顯赫的學者，對於地方史不屑一顧，認為是次等且不重要的。他們認為，真正的學者不會自貶身價去研究這些東西，尤其是中國的地方史。他們宣稱，新界村民都是蒙昧、貧困、骯髒、沒有文化的鄉下人；村民所住的村落骯髒且建造窳劣的；村民的記憶，除非有文字記載佐證，否則一文不值。在他們看來，除了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以外，其他的事都不值得書寫。他們會說，相較於國家首都的建築，鄉村廟宇和祠堂只是可笑的三流建築；墟鎮也不比鄉村好到哪裏去，不值得花時間和精力去釐清它們的歷史；鄉村學校的質素非常低劣，學生即使學習多年，也應該視之為與文盲無異。他們一再強調，村民和鄉村的歷史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或長久的價值。

對筆者來說，這種觀點實在令人難以接受。新界村民的識字率頗高，文化底蘊也很深厚，儘管這與都市裏或宮廷上的文化很不相同。雖然村民遠遠稱不上富裕，但並非貧困；除了在荒年之外，他們通常有許多食物可吃，不虞匱乏。住在宮廷和京師周邊的那大約 3% 的中國人，並非唯一值得研究的中國人，儘管他

們的偉大文化和深湛教養，常被說成是唯一貨真價實的中華文化和教育，而其餘 97% 的普通百姓，則被認為毫無研究價值。但是，這些村民、漁民和地方商人是我們的祖先，他們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了解祖先的生活方式必然是極有價值的，且具有實際和長久的重要性。筆者畢生致力向當今的年輕人闡明他們先輩的生活和奮鬥，並為此俯仰無愧。

香港的年輕人愈來愈有興趣認識地方史，特別是新界史——新界傳統村民在城市化發展前的歷史，對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本書共有六章，其中三章討論以種植稻米自給的鄉村地區（北大嶼山、西九龍和西貢）；一章討論新界以及香港島南緣的港口城鎮；另一章討論維多利亞港東北岸的採石村落；最後一章討論兩個寮屋村的發展和歷史，一個位於新界北部，另一個鄰近九龍城。書中也討論了九龍城、油麻地、深水埗、筲箕灣和西貢等墟鎮，以及多個港口城鎮的歷史與發展。這六篇文章並非筆者所做的同類研究的全部。筆者之前的著作 *Settlement, Life, and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New Territories* 包含另外六篇文章（關於廈村、洪水橋地區、沙田、南丫島、馬灣和東平洲），此外筆者還發表了另外六七篇獨立的論文。其他學者，特別是許舒（James Hayes）、裴達禮（Hugh Baker），以及華琛和華若璧（James and Rubie Watson）等人，也撰寫了關於其他鄉村或鄉村地區極其重要的研究。因此，新界的許多地方，都已有學術研究探討它們的地方歷史和社會。對於能夠為澄清我們的地方歷史盡一分力，筆者感到無比自豪和欣慰。

本書以及其他同類著作，論述了新界傳統社會，以及所研究的鄉村地區的歷史。筆者的研究大致上沒有超越日佔時期，且主要集中在 1911 年之前的一段歲月。筆者不想討論較後的時期，是因為那時這些鄉村和村民，已逐漸與更廣大的香港地區的社會和歷史融合，變成只屬後者當中的一部分。這當然也是重要的研

究領域，但筆者會把它留待其他學者去研究。

筆者在研究這些新界村落的五十年間，結識了許多摯友。在為這篇簡短的序言畫下句點之際，我必須向他們的友誼致以謝忱。

夏思義

2025 年 6 月

目錄

i 高添強序

iii 中文版自序

xxi 前言

xxii 自序

001 緒 論

第 1 章

009 海南柵：大嶼山北岸的聚落與社會

010 大嶼山早期歷史：通往廣州的水路

017 史前時期

018 近世時期

023 大嶼山及宋末二帝

030 大嶼山聚落的形成：李昴英與李久遠堂

036 明中葉的大嶼山：葡萄牙人的佔領（1514 至 1521 年）及其後

041 明中葉的大嶼山：早期村落

045 大嶼山北岸聚落的歷史

045 東涌

057 白芒／大蠔

065 客家人與本地人

067 與李久遠堂的租務糾紛

071 東涌社群

075 東涌和大蠔灣填海
075 東涌灣
083 大蠔灣
086 社會與經濟：路和渡船
086 行人徑
088 渡船
091 東涌的佛教建築
091 地塘仔
095 羅漢寺
096 北岸傳統社會與經濟
109 漁業
111 教育
113 保安
116 宗教

第 2 章
121 西九龍：英國人到來之前

122 英國人到來之前的九龍
124 西九龍
128 尖沙嘴
146 油麻地
151 芒角村
156 「對面河」地區
157 深水埗
182 九龍塘
188 石硤尾
192 九龍仔
194 長沙灣的村落

第 3 章
205 仇與恨：早期西貢的聚落與政治，1550 至 1911 年

206 導言：地理環境與資料來源
210 1550 年前的西貢地區
215 本地人的聚落，1550 至 1725 年
216 蠔涌
222 沙角尾
225 北港
228 定居模式
230 西貢的客家人聚落，1669 至 1850 年
236 十九世紀初的地方政治
248 路與渡船
253 西貢墟
262 西貢的天主教
268 工商產業
274 結論
276 附錄：北港駱寵芳的生平和時代（摘自《駱氏族譜》）

第 4 章
279 地與海：鹽業、漁業與香港港口城鎮的社會發展

283 港口城鎮的早期歷史
294 大澳：建鎮之初

303 大澳：後續發展
311 長洲：建鎮之初與後續發展
328 坪洲
335 赤柱
341 香港仔 / 鴨脷洲
348 港口城鎮和陸上墟鎮
350 人口、經濟和社會
366 城鎮的管理

第 5 章

371 水道旁：鯉魚門地區的打石業與社會

372 建築石材貿易
383 石礦村的建立
388 筲箕灣
394 四山地區：地理形勢
398 四山社群
405 四山的廟宇
405 晒草灣天后宮
408 鯉魚門天后宮
413 鯉魚門：1941 年以前的歷史
417 鯉魚門社群：1941 年以前
428 鯉魚門社群：1941 年以後

第 6 章

433 寮屋區：有關侯王新村與古洞的歷史劄記

434 導言
435 九龍城侯王新村
435 九龍城
435 九龍城的早期歷史：1341 年以前
438 九龍城的歷史：1341 至 1930 年
446 九龍城的地理形勢
453 侯王廟及侯王新村地區：侯王廟的歷史
458 何家園
463 侯王新村
474 北區古洞
474 古洞地區
474 古洞村
479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古洞
484 戰後的發展
488 古洞墟市
488 古洞社會

496 參考文獻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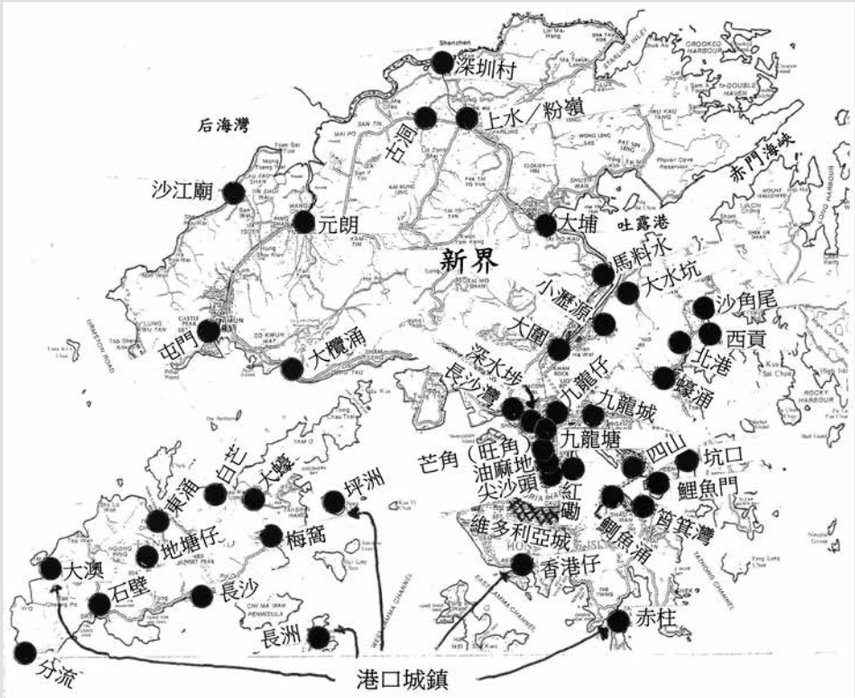
本書是 2020 年由城市大學出版社與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出版、同屬香港研究叢書的拙著 *Settlement, Life and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New Territories* 的續作，由六篇文章組成，論述香港特定地區的歷史和發展。有些文章的研究工作早在三十年前便已開始，但都經過徹底重新研究和改寫，並在此首次發表；另一些文章則是專為此書而寫的。各篇文章均代表筆者由衷相信的看法：對於任何真正平衡的歷史探索和研究計劃而言，本地史，以及本地社群的歷史及其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筆者首先要感謝已故的許舒博士（Dr. James W. Hayes）對本書撰述工作的幫助。許舒博士撰寫了多篇關於長洲、大澳和坪洲的鴻文。筆者一直認為，這些材料可以糅合在一起，成為關於港口城鎮的整體分析研究。許舒博士大方地允許筆者重新彙整這些材料，修訂為專為本書而設的全新研究，對此筆者實在不勝感激。許舒博士同樣大方地允許筆者重寫他關於「舊英治九龍」（“Old British Kowloon”）、「長沙灣村落」（“The Cheung Sha Wan Villages”）的文章，以及他對「四山社群」（“The Four Stone Hills Community”）的研究，否則本書中的文章〈西九龍：英國人到來之前〉和〈水道旁：鯉魚門地區的打石業與社會〉就不可能寫成。筆者還大量引用了已故的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關於深水埗的著作。筆者對他們銘感五內，非言語所能表達其萬一。

地圖 01 顯示本書探討的村落社群的所在地，以及書中提及的一些重要地點。

本書英文版所提及的香港地名，均以香港政府在 1960 年出版的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為準，每章

｜地圖 01｜本書提及的主要地點



首次出現時附上漢字名稱。內地的地名一般以漢語拼音寫出，在首次出現時附上漢字；而廣東省內的地名，則以標準的粵語羅馬拼音寫出，並在首次出現時附上漢字和漢語拼音。新界氏族成員及其他講粵語人士的中文人名，都以標準粵語的音譯寫出，首次出現時附上漢字；其他人名以漢語拼音寫出，首次出現時附上漢字。中文用語在有需要時也會以標準的粵語羅馬拼音寫出，並在首次出現時也附上漢字。英文版也附有詞彙表，列出所有在書中使用或引述的中文用語。此外，

英文版附有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涵蓋書中所提及的所有人名和地名。

筆者還要感謝眾多鄉村耆老抽空解答各種問題，並耐心解釋了許多對他們來說是不言而喻，但筆者卻需要獲得指點才能明白的事情。筆者十分感謝他們的時間和包容。這些耆老有超過 100 位之多，無法在此逐一列舉，但筆者對他們所有人都滿懷感激之情。

最後，筆者要向本書獻詞的對象高添強先生致以謝忱，感謝他在圖片方面的寶貴協助，以及在翻譯方面不可或缺的幫忙，更重要的是超過二十五年的友誼。他一次又一次幫助筆者，鼓勵筆者持續進行那些間或令人感到悵惘，甚或覺得毫無意義的工作。本書得以付梓，全因高先生的欣賞和肯定。雖然光說道謝是不夠的，但筆者還是要在這裏說一句「感激不盡」！

緒論

筆者成年後一直對地方歷史着迷。對筆者來說，尋常男男女女的歷史，他們居住的村落，他們耕種的土地，他們養育家庭的房屋，他們購買生活所需的墟鎮，他們拜祭神明的宗教場所，他們的辛酸與成就，這些事物的生命力都是帝王所不能比擬的。這些人是我們的祖先。他們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樣的歷史才是歷史的真正核心。

筆者在五十多年前來到香港，自此一直研究香港的地方史，尤其是新界村落和墟鎮的歷史。他覺得這些歷史總是引人入勝，而且是個能帶來極大滿足感的研究領域。過去五十年間，有大量關於這些鄉村社群的歷史的著述已出版。[1] 今已

1 例如 James W. Hayes（許舒）的多篇論文，結集於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Archon Books, 1977)，當中包括關於長洲、大澳、石壁、貝澳、牛頭角和九龍城的文章；以及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當中包括關於坪洲、舊英屬九龍、大潭篤、長沙灣和荃灣的文章。他也在 *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詳細論述荃灣。Hugh Baker（裴達禮）寫過上水，見其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68)。關於長洲的著述很多，包括許舒的 "Notes and Impressions of the Cheung Chau Community"（載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ed.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9-103）和收錄於 *The Hong Kong Region* 的文章，Choi Chi-cheung（蔡志祥）的 "Reinforcing Ethnicity: The Jiao Festival in Cheung Chau"（同樣載 *Down to Earth*, pp. 104-122），以及 David Faure（科大衛）的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科大衛也寫過錦田，見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及 "The Tangs of Kam Tin: A Hypothesis on the Rise of a Gentry Family"（載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也可參看 Chan Wing-hoi（陳永海）的 "The Dangs of Kam Tin and their *Jiu* Festival"（載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9 [1989], pp. 302-375）。已故的 Rev. Carl T. Smith（施其樂牧師）寫過 "Shamshuipo: From Proprietary Village to Industrial-Urban Complex"（載 *From Village to City*, pp. 73-105），又與許舒合著 "Hung Hom: An Early Industrial Village in Old British Kowloon"（載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5 [1975], pp. 318-324），兩篇文章都重刊於其文集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筆者曾發表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載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39 [1999], pp. 1-78）、"The Alliance of Ten: Settle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Sha Tau Kok Area"（載 *Down to Earth*, pp. 123-160），還有 "Eastern Peace: Sha Tau Kok Market in 1925"（載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3 [1993], pp. 147-202）、"Sheung Wo Hang Village, Hong Kong: A Village Shaped by Fung Shui" [與 Lee ManYip（李文業）合著，載 *Chinese Landscapes: The Village as Place*, ed. Ronald G. Knapp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以及收錄於其 *Settlement, Life and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with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2020) 中講述廈村、洪水橋地區、沙田、南丫島、馬灣和東平洲的六篇文章。

｜插圖 050｜1998 年的大澳新村天后廟

｜插圖 051｜2014 年的大澳關帝廟

三百餘載」。[36] 儘管這些年份都不甚準確，但似乎都指向晚明，也許是 1600 年左右，或者稍早一些。

石仔埔的洪聖廟內，一篇 1802 年的碑文說：「洪聖古廟，創建以來，威靈萬古」。這種說法通常表示建廟年代超出最年長居民的記憶，也超出了最年長居民年輕時從當年耆老口中聽到的故事，亦即至少比碑文的年份早 100 年或以上。因此，在本例子中很可能是指大嶼山在遷海令撤銷後獲准復界之前（即 1682 或 1684 年，後一個年份是重新開放海洋的時期，而前一個年份是朝廷准許人們再次在這個島上定居的時間），因為遷海令撤銷後於此地建立的任何新廟宇，在 1802 年時大概都在記憶範圍之內。[37] 這種說法大致重複於 1840 年的碑記中（「不知創建於何年」）。[38] 不過，在光緒年間（1875–1908，較有可能是光緒初年）的碑文中，這種說法變成「大澳石仔埔，向有古廟，建自前朝，歷年已久」。[39] 這當然也很含糊，但似乎又一次指向明朝，大概是晚明。

墟鎮上的天后廟（與關帝廟相鄰，在十九世紀的一次重修後，合建在同一屋簷下）僅在 1835 年的碑文中說「不知創建於何年」。[40]

這四座廟中現存年代最久遠的物品，是這幾家廟內分別收藏的幾個銅鐘，鐘上銘文的年份分別是 1713 年、1741 年、1746 年和 1772 年。[41]

然而，大澳的主要廟宇，是位於鎮外的楊侯古廟（見插圖 049）。大澳鎮民深信此廟是鎮上最古老的廟宇。[42] 廟內有一篇 1877 年該廟重修的捐助碑記：

> 我澳楊侯古廟，歷創有年……民物安阜，均沾大德，是以地因神而靈，不特施威風於宋代，廟得寶而顯。[43]

36 同上註，第二冊，頁 335。
37 同上註，第一冊，頁 59。
38 同上註，頁 95。
39 同上註，第二冊，頁 390。
40 同上註，第一冊，頁 84。
41 同上註，第三冊，頁 656、663、665、674。
42 資料來自筆者與大澳耆老的討論。
43 此碑記並沒收錄於《香港碑銘彙編》。感謝許舒博士慷慨提供一份副本。

北區古洞

古洞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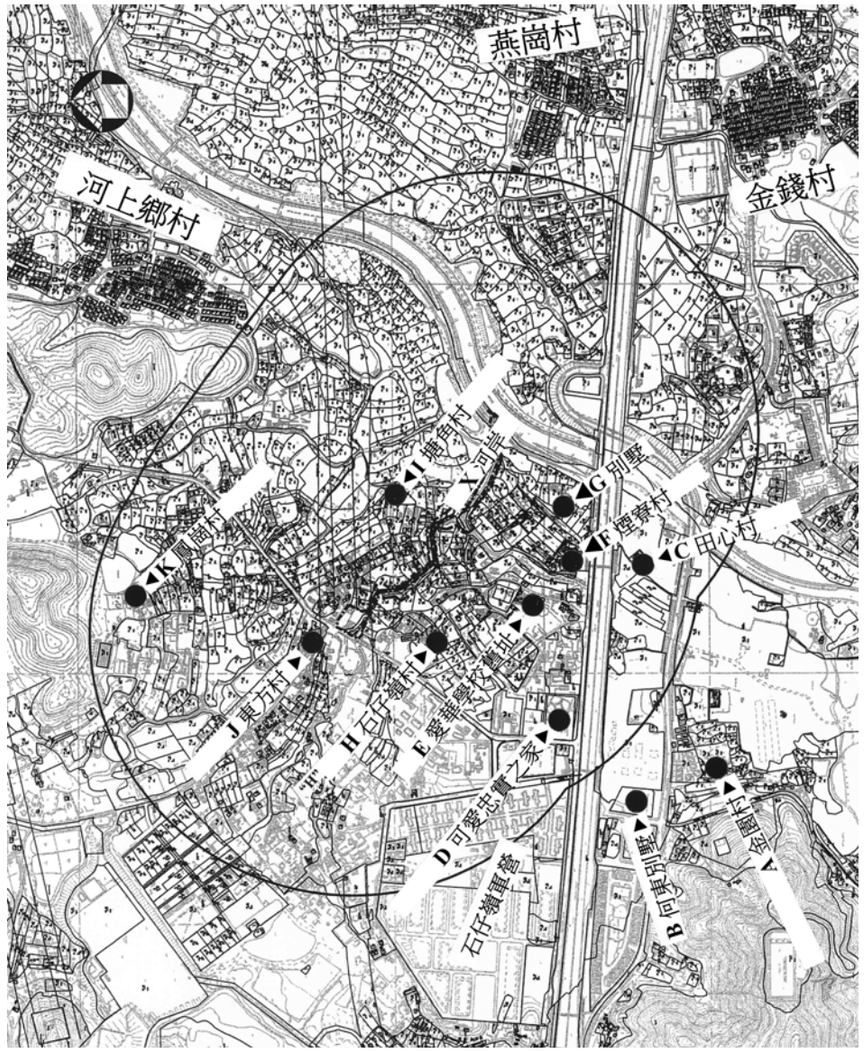
古洞是一個有不相連山丘的地帶，東面是雙魚河河谷，北面是深圳河。這裏的耕地大多澆薄貧瘠；唯一的優質土地在東邊，靠近雙魚河。而在十九世紀前的幾百年裏，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河上鄉、金錢和燕崗的侯氏（位置見地圖 65），或者新田和洲頭的文氏擁有，到了十九世紀，開始有居民遷入古洞的山區。

在十九世紀，各色沒有土地的人士開始遷來的香港地區，尋找可以耕種的土地，即使是偏遠的土地也不計較。而一群這樣的人就來到了古洞，開始在該處山丘之間的谷地開墾農田。他們從這裏山坡上開闢的田地大多是旱作地，無法或只能勉強種植水稻。在集體官契丈量土地時，這些土地大多數被英國人評為三級地，其餘大部分僅被評為二級地。

古洞村

在 1905 年進行集體官契丈量時，古洞一帶的居民，只有住在古洞村（又名「金園村」，在地圖 65 中的 A 位置）的一些客家家庭。1905 年時，那裏有 14 間房屋，由 8 名戶主擁有，分別來自周、林、梁、張四個家族。林氏、梁氏和周氏各有兩名戶主，而這些家族中的這兩名戶主，可能都是兄弟。林氏的情況尤其如此，從兩名戶主的名字（林東林、林耀林）看來，兩人很可能有緊密的家庭血源關係。林氏擁有的耕地，大部分登記在較為年長的林耀林名下，類似的安排在集體官契丈量中十分常見。周氏和梁氏的大部分田產，也都是由各自兩名戶主中較年長之人（周全興、梁金興）持有。1912 年至 1915 年的地圖（見地圖 66）顯示了這種情況，當時古洞一帶唯一的聚落是在古洞村。

古洞最早的村落大概建於 1800 年左右，該村最早可見於 1819 年《嘉慶新安縣志》的村莊清單。[41]

41 《嘉慶新安縣志》，卷二，載《深圳舊志三種》，頁 655。

| 地圖 65 | 古洞地區